

深情怀念印度尼西亚(上)



夏明夫妇带儿孙摄于广州

我1938年生于印尼西加里曼丹山口洋属下的邦夏假狮村，今年82岁了。我的爷爷是从中国广东下南洋到西婆罗洲的，我的爸爸也是在西婆罗洲出生，我是第二代侨生。（印尼独立后婆罗洲才改称加里曼丹）我在西加里曼丹生活了22年，在那里的中华小学和南华中学读完初中课程，在邦夏中华公学和孟加影华侨中学当了五年教师。1961年移居雅加达，在打石巷的中药行打工，1962年6月转到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办事处工作，1965年7月免费乘“光华”轮回到中国广东，在广东的惠阳潼湖华侨农场务农七年，后来调整安置广州，先后在华侨旅社、华侨实业发展总公司工作到1998年退休。

我在印尼生活了26年多，在中国大陆生活了55年多年。

我是中国人，我热爱我的祖国；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我的爸爸妈妈在印尼生

活了一辈子（我的妈妈出生在中国广东，8岁时由来往南洋和中国大陆的水客带到婆罗洲），他们的坟地和骨灰都在印尼，我有许多亲戚朋友在印尼，我也热爱印度尼西亚，这是非常自然的正常的感情。

我还是3个月婴儿的时候，我的爸爸因病去世了。日本南侵的时候，我们全家躲到椰林下姑姑家里，二战结束，大概在8岁时跟着妈妈、哥哥姐姐迁到山口洋郊区。山口洋是华人聚集的小县城，所以我从小就生活在华人的圈子里，当地人，主要是马来人、马都拉人生活在偏远的乡村。当地人称我们中国人为唐人。我的家在郊区，因而我童年的发小，除了唐人的小朋友，也有附近的马来族小朋友。说实在话，当年我的小脑袋里，有唐人优秀的观念，看不起刚刚独立的印尼人。没有人教我们这样想，而是从先辈那里潜移默化来

的。因为印尼独立前是荷兰的殖民地，许多唐人到南洋以后，在荷兰殖民政府的政策驱动下，开矿山、大面积种植橡胶林、椰子园、香料园、开垦土地、兴修水利、筑路建房、开工厂作坊，把许多乡镇和城市建立起来。有许多唐人在荷印政府里做事，有甲必丹、老大等等。我的曾外公就是鹿邑的林姓甲必丹，相当乡长，他原为鹿邑（Montrado）金矿场的掌门人，后被荷印政府任命为甲必丹。（我的妈妈被水客带到南洋后，到西婆罗洲鹿邑林家，女主人把她作为养女，到18岁嫁给我爸爸），我的爸爸从小接受荷文教育，后来做了老大，相当村长。常年为荷印政府收税及维持治安，配有枪械。爸爸病死后，枪械上缴，但我的妈妈可以享受抚恤金(pension)直到1981年逝世。印尼独立后，荷印政府移交政权，改朝换代，抚恤金却延续不断，虽然由于币值变更，抚恤金数值已变得微不足道，但也慰藉妈妈守寡40多年的心灵。

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家选择了“脱籍”，即保留中国国籍。当年山口洋堪称“小延安”，华人大都是升五星红旗，拥戴新中国，拥护毛泽东。我读书的小学、初中，每周一的周会都会升五星红



棉兰华人区

旗，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每年10月1日，山口洋的每条街道，家家户户都是五星红旗飘飘（后来按当地政府规定，五星红旗与红白旗同时升起）。中小学的课本，基本上是按照新中国的中文教材在本地编印。初中有印尼文和英文课。1958年左右，增加印尼历史、印尼地理课。并且要求中小学教师必须通过印尼文教部的印尼文考试才能执业。

我和同学们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大都希望读完初中或高中就回中国深造。从50年代初，山口洋就掀起回国浪潮，这种社会氛围正如摆脱了荷兰殖民政府而独立了的印尼人民期望过独立后的新生活一样，华侨期望回中国去过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是天经地义的，并非对当地有什么恶感。我家的两个堂哥、一个表哥及我的三哥都先后在1950、1951、1953、1954回国。（姑妈是从广东下南洋

的，她第一个在1950年带着表哥回国），他们最后也先后在广东广州、德庆、揭阳及海南万宁终老。

我记得到了初中，学校就有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教育，尤其是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尊重独立了的印度尼西亚，要尊重印尼人民，要求华侨要融入当地，鼓励华侨加入印尼国籍，落地生根。我的思想也开始改变，知道不可以看不起印尼人民，不可以自认唐人优秀。逐渐树立起尊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尊重印尼人民、学习印尼文化的观念，在侨校和侨团的工作中，我和许许多多侨教侨团工作者一样，为促进华侨爱国大团结事业、为传承中华文化、宣扬印尼文化和中印友好事业努力工作。但我要求回国，要求离开资本主义社会，回到中国去过社会主义的生活的愿望，已经深深的烙在脑海中。